

崇高的蛻變

——新時期文學中的「文革」

• 王 坤

本文旨在從探究「文革」時期中華民族精神形態的主基調——崇高及其演蛻過程——入手，分析新時期文學有關作品的得失，以期引起世人對「文革」時崇高的悲劇根源的關注。

一 崇高——「文革」時期 中華民族精神形態的 主基調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早已形成了整個民族精神形態整一規範的傳統。尤其在歷史發展的重大關頭，整個民族精神形態的基調往往被定位於崇高，從而上下一心，求生存、圖發展。在發生於本世紀60年代中期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華民族精神形態的主基調又一次定位於崇高。

與全民族其他成員相比，最先投入「文革」的主力軍——知識份子與一代青年（兩者也有重合）——所懷有的崇高，還具有各自的特徵。中國

知識份子崇高感的產生，與繼承俄羅斯知識份子靈魂蛻變的傳統（如《復活》、《苦難的歷程》等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是密不可分的。且不說「文革」前的作品，單是看看「文革」後的《綠化樹》（張賢亮）、《感謝生活》（馮驥才）、《雪落黃河靜無聲》（從維熙）等作品，就不難體察到，主人公們在與惡劣的生存環境融為一體的殘酷、痛苦的精神歷程中，是如何走向新生、走向崇高的。由於經過了煉獄般的淬火，知識份子的崇高往往表現出一種外人難以理解的堅韌性，因而更具有神聖色彩。一代青年的崇高感的產生則與他們對平凡的鄙視有密切關係。梁曉聲對此曾作過堪稱精到的分析：「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人，只要是處在溫飽線以上的，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甚麼？是平凡。」^①生長在新社會的一代青年，自幼就浸潤在以崇高為基調的精神氛圍之中，是在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餵養下成長起來的；為他們樹起光輝典範的一代偉



因為是懷着崇高的信念投身「文革」的，所以紅衛兵們在回首往事時，總表示決不懺悔或決不後悔。安文江的《我不懺悔》非常典型地表達了那一代人的感情。

人、英雄們，同青年一代之間的年齡距離又緊密相銜着，這就給他們那普遍的青春心理特徵中又灌注了巨大的爆發力，使得他們的崇高更具有直覺性與純潔性。

保衛新時代的主題，確定了「文革」崇高的現實內容：以保證新的生產關係不致倒退為目標的「反修防修」，具體表現為重演國內革命的行動和進行國際革命的要求。在新時期文學作品中，最早準確而真實地描摹了當年那種精神形態的作品，當推鄭義的《楓》。李紅鋼與盧丹楓，本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戀人。他們以只有在「文革」前的文學作品中才能見到的革命前輩們在戰爭年代的精神面貌為榜樣，為革命事業英勇奮鬥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對革命敵人絕不留情直至大義滅親。兩個年青人彼此認為對方參加了立場反動的派別，因而互相廝殺，結果一個死於「文革」中的戰場，一個死於「文革」後的刑場。諸如

此類的片斷描寫，在有關反映「文革」的作品中俯拾即是。

雖然戰爭年代革命前輩的精神狀態與實際行動被一絲不苟地加以摹仿和重現，但人們崇高的表現並未到此為止，而是更加向前邁進一步，即提出進行國際革命的要求：因為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待我們去解放。特別是一代青年學生，他們不僅認為自己是在為保衛革命政權而戰，更認為自己正在投身於將革命前輩的最終理想變為現實的戰場，從而產生出「我覺得我就像保衛巴黎公社的戰士似的」感覺^②。

正因為是懷着這種崇高信念投身「文革」的，所以在回首往事時，那些紅衛兵們總表示決不懺悔或決不後悔。安文江的《我不懺悔》非常典型地表達了那一代人的感情^③，如果僅看動機而不管效果的話，他們的確有理由說：「想起『文革』，說老實話吧我不後悔，我可以懺悔，但我不後悔。」

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懷着卑鄙的目的參加的。」④他們最反感的，就是「事後諸葛亮」式的眼光與評價。

即便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雖然它給青年、社會和國家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難以彌補的傷痕，但它又的確確是在崇高的氛圍中拉開序幕的。「文革」前的個別先例不算，在正式號召發出之前，就有一些才華出眾的中學生自發地擔當了這場運動的尖兵⑤。正式號召發出以後，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懷着投身「文革」時的崇高感情和神聖信念，爭先恐後地參加了上山下鄉運動，其中有不少人還是瞞着家人不辭而別，或寫下血書才獲成行的。「當時下鄉和以後完全不同，自願，後來才被迫」⑥。由這場曠古未聞的運動所產生的「知青文學」，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變換風格、主題、色彩等，但「青春無悔」的底色迄今仍未見褪去，倒是益發顯得厚重了。

二 恐懼——崇高的鋪墊與陪襯

「文革」時期的崇高本身，並不是從外部強加於人的。在當時的現實條件下，它合情合理地生成、發展，被人們自覺自願地接受並推向全社會。但是，「文革」時的崇高又具有空前的特殊性：為社會認可的崇高資格，是預先給定、並隨時都可能被剝奪的。誰具有這個資格，哪怕其精神面貌與崇高相距再遠，他也仍舊是受到社會尊重的主人；誰不具有這個資格，無論其靈魂深處多麼崇高，他都會被打入「另冊」，處於全社會的監督、管制之中，「永世不得翻身」！

正是由於崇高的資格是預先給定，並且能夠被剝奪的，所以在崇高氛圍籠罩全社會的「文革」時期，人們一方面因對信念的執着、狂熱而處於極度亢奮的崇高之中，一方面又因崇高資格的得失而處於非常恐懼的精神重壓之下。對於那些沒有或失去了崇高資格的人來說，他們既要擔心更大的厄運降臨，更要害怕那獲得或恢復崇高資格的微小希望會隨時破滅。對於那些具有崇高資格的人來說，他們對自身崇高資格隨時可能被剝奪的危險的高度警惕，其實正是一種深層的巨大恐懼。為了擺脫這種恐懼，確保崇高資格不受威脅，人們常常用一些過火的行為來證明自己的純潔與堅定。即便身居高位者也不例外。

崇高資格是與家庭出身緊緊相連的。在「文革」之前，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取決於其家庭成分，已是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文革」時更就順理成章地演變為根據一個人的家庭成分來確定其應否具有崇高資格。家庭成分不好者，自然就生來不具備崇高資格。這些人以及與其有着血親關係、姻親關係的人，就是「文革」中最大的恐懼群落，以及遭遇最悲慘者。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時時刻刻都要擔驚受怕，常「吾日三省吾身」，視「安全系數」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己說了甚麼話，做了甚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系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系數猛增，心裏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⑦。正因為如此，他們追求進步的急切往往又是與擺脫恐懼的企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因此，在「文革」期間，知識份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一方面因信念的自

由於崇高的資格是預先給定，並且能夠被剝奪的，所以人們一方面處於極度亢奮的崇高之中，一方面又因崇高資格的得失而處於非常恐懼的精神重壓之下。

覺、堅執而成為典型的崇高者，另一方面又因崇高的資格問題而成為典型的恐懼者。他們那麼積極地、鍥而不捨地追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了對信念的執着外，在其動機的深層，應該說還包含着尋求庇護與安全的隱衷。為了減輕恐懼的威脅並增加安全系數，他們常常本能地將崇高推衍到極端，形成一種極「左」的心態模式。而在現實生活中，恐懼感的重壓又迫使他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唯唯諾諾，顯現出人格上的完全萎縮和精神上的徹底失敗。《啊！》(馮驥才)中的吳仲義，僅僅為了一封家信暫時找不到，便惶惶不可終日，最後終因承受不住恐懼的巨大壓力，主動交待了信的內容，給哥哥一家及諸多朋友帶來了滅頂之災。

由於不具備崇高資格，那些成分不好者只能作為崇高者的鬥爭對象、暴行的承受者而存在：但在整體上，恐懼者與崇高者又是處於同一思想層面上的，於是，就產生了「文革」中的一種特殊現象：恐懼者對崇高者的心理認同。這種心理認同，首先表現為在遭到批判、鬥爭時，許多批判對象都有一種被冤枉了的感覺：我跟你們一樣，思想是非常革命的……。其次表現為對指認的「罪行」誠懇地認罪、由衷地反省。巴金回憶那時的情景，曾特別指出自己當時的確自認為有罪^⑧，甚至事先偷偷練習低頭彎腰，以便在被批鬥時表現得好一點^⑨。再次表現為自覺地接受由「血統論」所產生的「父罪子贖」的做法。《綠化樹》中的章永璘就宣稱：「我所屬的階級覆滅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在一些受到批判的作家身上，這種心理認同表現得尤為典型、特別突出：在極為艱險的環境中，他們仍然默默地深

情讚頌給自己帶來厄運的時代熱潮。郭小林於1971年寫的長詩《誓言》，雖因其父(郭小川)之故未得發表，但一面世就引起轟動，被認為超過了後來公開發表的《理想之歌》^⑩。李英儒在秦城監獄裏冒死秘密寫出來的作品(其發自肺腑是絕對無可置疑的)，仍然「革命」得令其子女都吃驚^⑪！

遇羅克是他們當中覺悟最早、覺醒程度最高的一個。但他的矛頭所向，恰恰就是事關崇高資格的「血統論」^⑫，其目的首先就在於要求恢復被這種理論所剝奪的崇高資格。從整體上講，在意識形態一元化的前提下，受害者的真正覺醒不可能比施害者提前許多。巴金在事後的回憶中就曾直言不諱地自責道：自己當時並未認識到「文革」是錯誤的，反對自稱一貫正確^⑬。在楊沫的日記中，亦可見到此種內容^⑭。從這個意義上講，1976年「四五」運動的爆發，就意味着正式宣告「文革」在精神上的失敗與事實上的結束。

三 崇高與恐懼並存下的 主要派生心態

崇高與恐懼的並存，是「文革」時期中華民族精神形態方面的最主要特徵。以下種種心態流變，都是由此生發出來的。

(1) 滑稽與荒謬

滑稽與荒謬，是崇高與恐懼並存下的頭生子。由於企望獲得或恢復崇高資格，以及擔心失去崇高資格，誰都會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懷有的崇高發揮到極致；同時，誰要想

恐懼者對崇高者的心理認同，首先表現為在遭到批判、鬥爭時，許多批判對象都有一種被冤枉了的感覺；其次表現為對指認的「罪行」誠懇地認罪、由衷地反省。

證明自己的崇高是正確的、真誠的，從而成為鬥爭者而不是鬥爭對象，誰就必須絕對地、無條件地忠誠於掌握着識別正確與錯誤、真誠與虛假的判斷權的最高領袖及其信任者。於是，越忠誠越保險，越「左」越有利，人們幾乎是本能地選擇了「左」作為保护自己的精鋼盾牌。在崇高與恐懼的雙重刺激之下，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被革命色彩包裹起來了，因為只有這樣才最安全。於是，極淳樸的人士、大字不識的文盲，也都常常滿口激進的革命詞句。只要能與「革命」扯上邊，怎麼做都不用擔心會過分。如為革命而吃飯、為革命而睡覺……。姜昆的成名作《如此照相》，就是因為對此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與諷刺而轟動一時。

忠於領袖的主要內容，除了「三忠於」、「四無限」之類外，就是發現、揭發那些反對、攻擊領袖的言行了。索引式的查罪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推廣從而達到高潮的。據梁曉聲回憶，當時「哈爾濱」牌香煙盒被發現有「反標」，因為「哈爾濱」三個字的拼音經過「翻面、倒過來、朝向陽光」這三個程序，就可看到「牛乃文主」四個字——牛乃文是當地一名領導幹部的名字^⑮。而這種發現當時在全國各地是屢見不鮮的。一旦這發現與政治需要相吻合或無礙大局，那罪行就得以成立。於是便出現了「文革」前的整人者在「文革」中被整，昨天的批判者今天被批判的局面。由此，那些因歌頌、讚美領袖而獲罪的事例也就並不稀奇了^⑯。

(2) 自殘與殘人

為了盡可能地擺脫、緩解恐懼，那些不是紅色家庭出身的人便常常用

近乎自殘的方式來拼命表現自己，以期讓社會認可他們對領袖的忠心與革命態度的堅決。儘管在「文革」之後，當年的「緊跟」、「忠誠」之類的言行遭到了辛辣的嘲諷，但我們千萬不要忘了，許許多多的成分不好者，在當時是多麼地渴望獲得「緊跟」、「忠誠」的資格而又絕無可能^⑰！《柳葉桃》（張斌）中所講述的在成分論重壓之下的一個現代祥林嫂的故事，極具典型意義。除了自殘外，更有人通過摧殘他人的方式來表現自己。「文革」中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過火行為，有許多都是受害者的同類人幹的。為了爭取早日「出頭」，他們在整人時往往比一般人下手更狠。「文革」中盛行一時的「劃清界線」之舉，則是集自殘與殘人於一體的典型行為。當事人多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其「大義滅親」的舉動中，既包含為崇高所激勵的因素，也包含擺脫恐懼，尋求社會庇護的因素。如王文琪，為了獲得加入「紅衛兵」的資格，大義滅親地揭發自己的父親曾當過國民黨兵的經歷，從而將其逼上絕路^⑱！絕愛與棄恨，是自殘與殘人的更為普遍，也較為和緩的表達方式。尤其是不敢愛，在「文革」中是極常見、極普遍的現象。《傷痕》（盧新華）中的王曉華就是一個不敢愛的典型人物：為了「劃清界線」，不敢愛家、不敢愛媽媽、不敢愛戀人……。「不敢愛」本身就是一齣人間悲劇。^⑲在這悲劇的背後，是無數破碎的家庭和破碎的心靈！至於不敢恨，則是人的心靈在無法承受的重壓之下失去了正常功能而至麻木的結果。當不敢愛與不敢恨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開始擠撞其原生範圍時，愛與恨的顛倒就作為它們的泛化形式出現了。

忠於領袖的主要內容，除了「三忠於」、「四無限」之類外，就是發現、揭發那些反對、攻擊領袖的言行了。據梁曉聲回憶，當時「哈爾濱」牌香煙盒就被發現有「反標」，而這種發現當時在全國各地是屢見不鮮的。



「文革」中種種非理性的過火行為，體現了那一代自殘與殘人的集體潛意識。

(3) 虛偽與狡猾

由於恐懼的陪襯與鋪墊，崇高不僅被當作盾牌與武器，更被當作一種攫取個人名利的手段與階梯。許多人的實際精神面貌與崇高風馬牛不相及，但通過千方百計地弄虛作假，他們仍然能為自己披上閃光的崇高外衣，從而達到個人受益的目的。《少將》(喬瑜)中的王滿山，本是一個連自己的名字也不認識的普通戰士，卻能力克群雄，摘取學習毛主席著作標兵的桂冠，其奧秘就在於他每天都盡可能地捧着毛主席著作(經常倒拿書本)翻來翻去，直至把書翻破、翻爛。最後，在評比學習標兵的時候，因任何參賽者手中的《毛選》都沒有他手中的那本磨損得厲害，他也就被認為下力最勤而獲得標兵稱號。他這樣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獲得提升，以期有朝一日，能重拾他那當少將的叔父在三年困難時期回鄉時的輝煌：給餓得奄奄一息的鄉親們「啣人啣」(河南方言：一人一個)饅頭。由於崇高的實際內容在現實中發生了質變，人們

在面臨相關的事件時，其智慧也不得不變形，以狡猾的方式表現出來。《一百個人的十年》中所記述的那位白連長，在處理拉練途中戰士因過度疲勞而摔碎毛主席瓷像的事件時所顯現出來的智慧，真是讓人永遠都難以忘懷，永遠都要為之叫絕！

(4) 殘忍與冷酷

在「文革」中，許多人在崇高的激勵下，出於一時衝動而有過火行為；也有許多人迫於恐懼的潛在壓力，隨波逐流而至助紂為虐；但更有一些心術不正之人，由於佔據了特定的位置，便在革命的名義下，在合法的舞台上，以肆意整人、折磨人為快事，將人性中的醜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啊！》中的賈大真利用政工組長這個職務對吳仲義所具有的強大威懾力，巧施心計，將其從精神上徹底整垮。而他卻從欣賞吳仲義極度緊張、無比痛苦的精神狀態的過程中，獲得莫大快感。《芙蓉鎮》(古華)裏的王秋赦，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地痞無

賴，憑藉紅色出身之便，以甘當走卒、打手而躋身於政治舞台，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靠整人、折磨人風雲一時；在精神失常之後，仍在本能的驅使下，急切地呼喚着「運動」的來臨。

四 崇高的悲劇根源

恐懼機制的存在，直接導致了崇高的變質。但最主要的還在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而英勇奮鬥時所懷有的崇高，與「文革」時的崇高相比，表面形式是一樣的，實際內容卻相反。前一種崇高的擁有者及響應者，其物質生活水平是隨着崇高的逐步實現而不斷改善、提高的；後一種崇高的擁有者及響應者，其物質生活水平是隨着崇高的繼續保持而且日漸固結、降低的。因而，那時只能「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發展，人民因困難生活的年月」^②。而且，在對物質生活作橫向比較時，「文革」時所使用的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參數。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人們無從了解世界真相，妨礙了人民對崇高變質的覺察。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隨着改革開放，這種受到歪曲的參數才逐漸得到糾正。

在新時期反映「文革」的作品中，真正觸及到崇高悲劇根源的傑作，還不多見。梁曉聲的自傳體小說對此有一語中的之論，但因不是主筆所在，力度畢竟有限。最為令人服膺的，目前恐怕還要算莫應豐的寓言式長篇小說《桃源夢》^③。小說描寫一群貧窮而善良的人，在飽受現代文明社會中黑暗勢力的欺壓之後，逃到一個名叫「天外天」的高山絕地重組部落，並從

此將全部精力都用來推行一種在山下的社會裏絕對不能實行的「善道」。當地奉行不努力去改變貧窮、而盡量去適應貧窮的決策思想，而且認為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只能逆向而行。應以精神上的富有完善來抵消、掩飾物質上的貧窮落後，以安於箪食瓢飲為最高人格的修養標準，等等。「天外天」在珍珠姑娘帶上山來的現代物質文明氣息的吹拂之下，終於徹底解體。作者虛構的這個「桃源夢」，為我們認識「文革」崇高悲劇的根源，提供了一個極佳的視點，同時，也為我們反觀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提供了一種新思路。要說中國傳統文化與「文革」有甚麼聯繫的話，那麼最主要的，就是傳統文化中很少有把物質財富的創造當作治理國家的頭等大事的學說，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把重點放在物質財富的分配理論上，放在培養對待財富分配的謙謙之德上。就像《桃源夢》裏的「天外天」那樣，長期奉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金科玉律。

「文革」時的崇高是排斥物質內容的，但生活在「文革」時代的人又不可能停止對物質內容的需求，於是，人們只好讓自己的物質需求以被扭曲的形式出現在生活之中，即將一切物質需求都冠以革命的名義。崇高之所以蛻為滑稽、荒謬，除卻恐懼的作用外，最主要的根源還在於此。值得深思的是，古往今來，凡是提倡精神生活高於物質生活的論者，往往都是自身無衣食之虞的人。在「文革」前，尤其在「文革」中，這種現象更為突出。對貧窮的積極肯定者與大力謳歌者，他們與貧窮的實際承擔者之間的物質生活條件，是存在着巨大差別的。「文革」之初，廣大人民群眾之所以對「反修防修」一呼百應，其熱情中實際

在新時期反映「文革」的作品中，真正觸及到崇高悲劇根源的傑作，還不多見。最為令人服膺的，目前恐怕還要算莫應豐的寓言式長篇小說《桃源夢》。

上也包含着貧窮承擔者對富裕享受者的不滿的一種發泄。而「文革」之中最醜惡的事情，又莫過於那些高聲讚美貧窮的人，憑藉其手中的權力，用人民的血汗去滿足他們冠以革命名義的物質奢求。也正是在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還很低下的大背景中，才會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就產生出像《將軍，不能這樣做》（葉文福）、《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熊召政）那樣的強烈震撼社會的作品。

從整體上講，一個社會的物質文明程度與精神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在物質生活極其貧困的國度裏，人們的精神狀態很容易受到扭曲而走向極端。新時期文學在反思「文革」的悲劇根源時，大多尚未意識到「文化大革命」不是搞錯了，而是根本就不該搞！前者隱含着一個結論：「文革」有正確的搞法——不該打倒「這個人」，而應打倒「那個人」。《一百個人的十年》中，有一篇就叫做〈我不是右派，是左派〉，其中的主人公即是持這種態度的典型代表。《大牆下的紅玉蘭》（從維熙）裏則乾脆讓國民黨還鄉團出場來折磨我公安幹部。連同《看守日記》（齊平）、《羅浮山血淚祭》（中傑英）、《一個獵人的懇求》（烏熱爾圖）等作品一起來看，作者們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文革」通過應該打倒的人之手，把不該打倒的人打倒了。這種看法是極為膚淺的。像「文革」這樣的精神革命運動，既不以物質內容的實現程度作為檢驗崇高的尺度和制約崇高的機制，又對相關的參照系數加以歪曲，並且還以恐懼作為崇高的陪襯與鋪墊，這就使得崇高的發展、演變，必定是一個無再生機會的自我否定過程。這種運動一旦展開，就必定要出大錯：而且犯錯誤的人大都不是

因為個人的品質惡劣。所謂正確的搞法，充其量不過是批判者與批判對象互換角色而已；對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來說，悲劇的結局不可能改變。

註釋

①⑤⑬⑳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頁219；71-73；155-199；386。

②④⑥⑦⑯⑱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228；228；38；177；見該書〈拾紙救夫〉那一章；頁346。

③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第5集（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頁229-335。

⑤ 參見鄧賢：〈中國知青夢〉，《當代》，1992年第5期。

⑧⑨⑬⑰ 巴金：《隨想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2卷，頁95-99；第3卷，頁39；第1卷，頁65；第3卷，頁121、第5卷，頁92。

⑩⑪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頁242-247；353-379。

⑫ 參見遇羅錦：《冬天的童話》；王晨、張天來：〈劃破夜幕的隕星〉，收入《歷史在這裏沉思》，第3卷（華夏出版社，1986）。

⑭ 楊沫：《自白——我的日記》（花城出版社，1985），頁7、593、633。

⑳ 首次登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建社35周年紀念專刊：《當代長篇小說》上；1987年該社又出版了單行本。

「文革」中最醜惡的事情，莫過於那些高聲讚美貧窮的人，憑藉其手中的權力，用人民的血汗去滿足他們冠以革命名義的物質奢求。

王 坤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將任職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文章。